

求知·致思·力行：儒家学习观的传承与借鉴

赵明亮

(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国有资产管理处,江苏 扬州 225127)

摘要:儒家思想一直在中国古代思想流派中占据主流地位,儒家学习观贯穿于古代教育史全程中,对于当下教学理论建构依然具有生命力和指导价值。从孔子的学习过程三段法到《中庸》的五环节法,再到朱熹的七阶段法,“求知、致思、力行”一直是贯穿历代学习思想的一条主线。从求知、致思、践行三个维度对古代儒家学习思想进行梳理,探讨中国古代学习思想的流变与规律,对当下教学实践与理论建构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求知;致思;践行;学习观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 5092(2018)04 - 0064 - 04

中国古代儒家学习思想大致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孔子为代表的春秋时期学习思想、乐正克和孔伋为代表的战国时期学习思想、朱熹为代表的宋代学习思想以及吴澄、王阳明、王夫之等学者为代表的元明清时期学习思想。儒家学习思想既包括学习目标、学习动机、学习方法,也包括学习意义、学习本质、学习规律、学习原则、学习内容构成、学习过程、学习顺序、学习组织形式等内容,可谓内容丰富、内涵多样,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1]10}。从孔丘到孟轲、荀况等后辈儒家学者均有对学习思想的相关论述,本文试图立足学习观视角从求知、致思、践行三个维度对古代儒家学习观念深入探讨,以为当下课堂教学提供借鉴。

一、求知：物质性存在向精神性存在的超越

远古先民学习的知识信息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与日常生产劳动和战争训练相关的功能性信息，二是与宗教、艺术相关的非功能性信息。所谓“国之大事，惟祀与戎”便是很好的注解。人类早期学习内容最初主要集中于学会认识、使用、创造劳动工具，从先辈那里或者从劳动实践中学会制造生产工具和获得生活用品的方法和能力，以维持人类种族的繁衍生存。后来，儿童从成人那里

学习狩猎、耕作、战争、祭祀及部族管理等知识。文字发明以后，人类教育突破了时空的局限，便从以实物表达走向语言符号和图形表达转变，基于现实实物世界创造了观念和知识的世界。文字产生使得知识信息日渐固化下来，学习从直接的经验学习转向间接的经验学习，从社会学习转向学校学习、从生存实践走向文字与文化，从物质性存在走向精神性存在。

奴隶社会夏、商、西周时期，“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三代教育必须共同学习的内容，各代有所侧重：夏代尚武、商代敬神、到了西周尚文武兼备。“六艺”被称为六种艺能：书、数为小艺，为民生日用之所需，礼、乐、射、御为“大艺”，兵戎之事须学习射、御，而“明人伦”又须学习“礼”与“乐”，是贵族从政必备之治术。后来，射御之教从军事实战训练逐渐衍化为一种诱射与司射的祭祀性射礼。礼与乐最初主要孕育于原始宗教，经统治者选择与推广，贴上以德配天的标签成为一种人伦规范，逐渐成为“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的治民法宝。书数之教，包含了数学与文字等学习的内容，成为信息记载与传播、事物数量计算统计的重要手段。总的看来，六艺包含许多文化历史知识、战争及生产生活方面的学习内容，除小学阶段的书数学习之外，

大学阶段的礼乐射御逐渐失去了昔日实用的价值,愈加成为一种礼仪与程式,学习内容再次从物质性存在向精神性存在超越^[2]。

到了孔子,他尤其主张“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重视历史文化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他于晚年从浩瀚的古籍文献中整理出《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经典,成为后代普遍化的学习教材,学习内容在“六艺”基础上多了“六经”。由于孔子自己对上古文献的整理与编撰,使得历代教学与人才选拔考试有了依据和参照。而且,孔子强调博学与好学,通过学习历史典籍进而获得治理国家和道德伦理的实用知识^[3]。

封建社会汉武帝时,董仲舒通过贤良对策为汉武帝推荐了一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文教方略,奠定了两千多年的儒学正统地位,先秦儒家经籍篇章结构阐明的经义成为学习的主要内容。“独尊儒术”的文化国策加之“五经博士”的设置,《五经》成为举国上下法定的学习文本。《《诗》《书》序其志,《礼》《乐》存其美,《易》《春秋》明其知。”^[3]六经作为学习内容被强化到极致。经学成为“训解、阐述儒家经典之学”。到了西汉末期,陆续发现了古文字写成的经书,于是出现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今文经学注重托古改制,阐发经典中的“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述而不作,读经、解经注重章句训诂、名物典制。

到了宋代,宋学诠释儒家经典,从对语言的表面结构进入意义的深层结构,不同于汉学的“语言的表面结构”的章句之学,他们吸纳了魏晋玄学家和佛学家“误读”儒家经典的方法,“不治章句,必求其理”以义理注释的方法学习儒家经典的价值信仰功能和对生活过程的指导意义。儒家经典的知识学意义不限于语言文字、历史知识,更是包括天道性命在内的价值信仰及相应的知识体系。可以说,汉唐注疏是注释学,发掘原典的固有意义,而宋明义理是诠释学,注重对原典理论的再理解,在诠释者的理解过程中不断生成新的意义。以“六经注我”为主,辅以“我注六经”,体现学习的创造性和学习内容意义的新的生成意义。

读经解经成为历代治世安民、学校育才、朝廷取士的重要标准,经致用成为重要的学习原则和途径。作为儒家道统的捍卫者,更是强调通过学习儒家经典来体认仁义道德。宋代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基于儒家立场创立了理学,常视读书为修身的方式,四书五经更是必修之内容。而宋代

的朱熹更是强调通过学习“四书”“五经”达到明白“事之所以”,发明“事之理”。而明代王阳明更是强调通过读经复明本心的常道,他认为:“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科举从始创于隋唐到清末废除,时间跨度长至1300多年,科举制度考试无不更加注重对儒家经典内容学习程度的考查。

从远古到清末,知识学习从强调生产与军事等实践技能的学习到强调儒家经典的学习,从强调实用价值的六艺学习逐渐走向远离生活的读书穷经的道德伦理知识学习,儒家倡导仁智统一的认识论,忽视对自然界的研究,将真归于善,求真的冲动往往被明善的努力所代替,学习内容从“实用”走向“虚化”,从“知识之真”走向“道德之善”和“伦理之美”,实现从物质性存在向精神性存在的超越。

二、致思: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

致知的途径主要有二:学与思,学是求知致能的起点,思是学习的进一步深化,以思驭学、学思结合才是正确的方法。儒家注重把握学生的学习机制,以提高学习能力并提出了启发性原则。孔子提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1]25}宋代朱熹对此做了进一步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1]37}启发一词便源此而来,儒家的教学思想着眼点在于启发思考,发展思维能力。启发式思想的另一层含义是相互启发,教学相长,和而不同。孔门师徒通过坐而论道的方式,学生通过分析、比较进而把握学习思想^[4]。后来,儒家学习思想分化为内求与外铄两派。孟子曰:“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1]20}主张有独立思考的精神。纯粹的接受式学习显然不利于构建新的社会伦理道德和社会发展的需要^[5]。

荀子意识到,人在认识上容易犯片面性错误,难以认识事物的全貌。《解蔽》说:“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解蔽正是保持正确认识的关键。解蔽的方法不是局限于事物的一个方面,而是把握事物的本质,是“兼陈万物而中悬衡”,对事物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是孔子“叩其两端”和中庸思想的反映。另外,荀况认为,心是藏与虚、两与壹、动与静的统一。藏与虚即既能接受已知,又不妨碍新知的接受。两与壹即辨别差异、兼

知万物,但专注此物,而不被他物所干扰;动与静即既能在活动,但不被无关思索所扰乱。因此,虚壹而静的理论是为要求达到广则能兼、专则能深、动静结合的高效思维的学习过程。此外,荀子还提出外铄论,强调善假于物,特别是古典书籍的学习,可以说几近于读经求知。

《中庸》指出学习经过的五个步骤:“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辨、行可以看作孔子学思行思想的进一步发挥,是“道问学”的具体化和系统化,其中,慎思和明辨属于思考的过程,可见思考在儒家学习思想中的重要性。明代王阳明认为,“所以为知者,不过思与见闻之会而已”。“故知之真由于思,行之察亦由于思”。(《慎言 潜心篇》),所以王守仁认为学习贵在精思。做学问还要在博学多疑的基础上精思。北宋张载认为,知识可以分为见闻之知和德性之知,德性之知的核心之一是穷理,穷理必须通过积极地开展思维才能完成任务。通过精思,可以使“义理有疑”处“濯去旧见,以来新意”。通过精思使无疑处有疑,有疑处无疑,进而取得学问上的长进。

从以上儒家学习思想发展脉络可以看出,独立思考被提到一个新的高度,随着语言文字的渐渐“陌生化”,不思考很难理解学习的知识内容,也更难发掘知识中新的价值。“致思”要求当下的课堂教学重视思维训练,要高度重视启发式教学和研究性教学,尤其是对文科知识的学习更要“知人论世”,不仅注重对文本知识内容本身的学习,更要理解文本知识经过历代不断解读所产生的新的社会价值。

三、践行:从主客分离走向辩证统一

知行观是中国古代认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贯穿于中国古代儒家学习思想的整个过程。《左传·昭公十年》提出“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古文尚书·说命中》提出“非知之艰,行之维艰”,最早的“知易行难”思想认识来源于此。

而儒家的知行观主要来源于孔子的教育名言“学而时习之”,学为知,习为行(践履),后儒将之归纳为“知易行难”观,强调人在学习中实践的重要性。儒家知行观强调知与行协调一致,以道德实践作为知行观的主要内容,而疏于思辨认知。孔子时代就提出了学习四教内容:“文、行、忠、信”,其中,行就是躬行实践,强调行的重要性。

到了宋代,程颐从“非知之艰,行之维艰”中提出“知先行后”的理论,理学家注重“知先行后”,二程认为必须先有知,后有行,不致知则行不得。有了“知”的引导,“行”必然顺利,否则难免迷失方向。后来,朱熹对二程的观点有所发展:“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学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朱子语类》卷九)朱熹继承二程在知行时序上先后关系,又提出了知行价值上轻重关系,从道德认知必须最终贯彻落实于道德行为的角度看,行比知更为重要,这是毋庸置疑的^[6]。

而明代王守仁在38岁就提出了“知行合一”学说,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传习录一》)。他在理论上反对传统知行观中对知行先后轻重的区分,认为朱学的错误在于把形而上本体论世界与现象形而下世界分为二,割裂了先验本体理性与感性现实世界的联系,知行二分使得道德知识与道德行为之间发生冲突。他批判地吸收了朱熹“行重于知”“知行相须”的观点,进而提出“知行合一”的学习观,当然,这里的知行观主要指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属于伦理教育的范畴。王守仁强调学习过程中知与行的连贯统一,表现为目的与过程、动机与效果、主观与客观、理性与感性的相互沟通。比较朱熹与王守仁的知行观,朱熹视学问思辨行为单线的逻辑进程(从口耳到心性再到身形),而王守仁则强调五者多路并发、整体互动的联合进程。

王阳明的知行观脱离了社会实践,遭到了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的批判。王夫之主张学思并重:“致知之途有二:曰学,曰思。学则不悖己之聪明,而一唯先觉之足效;思则不徇古人之陈迹而任吾警悟之灵”。他认为,行先知后,知行并进,互相为用。从强调实践理性,讲究实际的实学视角来看,王夫之抓住了王阳明的知行观的要害,通过对理学清谈的批判,尊重经史,旨在经世致用。当然,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王守仁的知行观混淆了知、行的质的规定性,否定了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但其知行合一学说与心理合一的目的一样,是让人放弃对书本文字的迷信,把人从天理的重压下解放出来,使个体道德

实践本身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心学教育高扬“知行合一”大旗,将一切道德归结于个体的自觉行动,表现出对道德的自我意识感和道德实践主观能动性的空前强化。这种重视主体人格的价值取向,沟通了伦理与审美两大领域,架起了德育(礼教)通向美育(乐教)的桥梁。

需要强调的是,儒家学习内容侧重的是道德思想学习,目标是为统治阶级培养治国统治人才。

韩愈曾在《师说》中也提出,“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1][51]}儒家认为道德伦理修养远远高于一般语言文化知识的学习,这有别于今天我们的高度重视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在加强德性知识学习的同时,注重思维和实践的作用,将知识转化为智力,培养德才兼备、人格健全的完人。

参考文献:

[1] 崔宜明. 先秦儒家哲学知识论体系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2] 汪乐. 先秦儒家的学习论研究[D].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6(5):25-55.
[3] 宗超. 孔子知论探析[J]. 伦理学研究,2016(1):38-42.
[4] 汤洪. 《论语》中的“学”“习”观[J]. 中华文化论坛,2016(6):101-107.
[5] 李长吉. 知识教学的使命:转识成智[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0(5):48-54.
[6] 孟勇. 论转识成智——从比较康德和冯契关于此问题的探讨谈起[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287-289.
[7] 贺腾飞. 文化与人格学派对教育科学的启示[J]. 民族高等教育研究,2015,3(2):15-18.
[8] 孙国权. 德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及其启示[J]. 民族高等教育研究,2016,4(1):15-18.

Seeking Knowledge, Thinking and Practicing:
The Inheritance and Reference about Confucian View of Learning

ZHAO Mingliang

(State-owned Assets Management Department, Yangzhou Polytechnic Institute, Yangzhou Jiangsu 225127, China)

Abstract:Confucianism has always dominated the ideological schools in ancient China. The Confucian view of learning runs through the whole ancient educational history. It also has vitality and guiding valu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urrent teaching theory. From the three-stage method of Confucian view of learning to the five-link method of “The Mean”, and Zhu Xi’s seven-stage method, “seeking knowledge, thinking and practicing” has always been a main line running through the learning thoughts through the ages. The author intends to sort out the ancient Confucian learning thoughts from the above three dimensions, and to study the evolution and law of learning thoughts of ancient China in order to serve the current teaching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Keywords:seeking knowledge; thinking; practicing; learning view

(责任编辑:沈建新)